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Raymond Williams 著

馮建三譯

電視： 科技與 文化形式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Raymond Williams 著
馮建三 譯

電視： 科技與 文化形式

傳播學名著譯叢

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

原書名／*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作者／Raymond Williams

譯者／馮建三

主編／陳世敏・潘家慶・鄭瑞城

責任編輯／彭春美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者／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184 號 7 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02) 365-3707

傳真號碼／(02) 365-8989

發行代理／信報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365-1212 傳真號碼／(02) 365-7979

印刷／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排版／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1992(民 81) 年 1 月 1 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25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1405-9

《傳播學名著譯叢》譯著前言

傳播學的發展，令人眼花撩亂？

這個學術領域，一度有人宣稱它逐漸消失了；有人說它走到十字路口，正待抉擇去路；有人說它潛沉蟄伏，蓄勢而發，就待春雷乍響。

這些片片馬賽克所拼湊的傳播學面目，像極了快速流洩而過的電腦動畫，令人無法預知下一秒鐘的圖像變化。新聞學延伸出來的媒介效果研究，歷經幾度枯榮，與社會科學結合，成為傳播學。還沒站穩腳跟，傳播學就迫不及待與其他學問進行分工與整合。現在的面目是：

第一、傳播學變成了其他學問的應用科學，產生了政治傳播、組織傳播、教育傳播、健康傳播、環境傳播、危機傳播等跨學科的新領域。

第二、傳播學向其他學問借光，逐漸自立門戶，形成傳播學的一部份枝幹，例如傳播社會學、傳播生態學、傳播政治經濟學、口語傳播學、大眾文化、傳播的文化研究、傳播的批判理論等領域，大大豐富了傳播學的內容。這方面，共同的源頭活水，是傳播革命。

短短五十年歷史，人類經歷了數次傳播革命，使傳播媒介深入社會，改造了當今人類社會的下層結構，也把傳播學術，一再推向另一個令人眼花撩亂的十字路口。

本譯叢目的，即在呈現傳播學繁複多變的面貌，選書時，不拘新舊、學派、取向、範疇，凡自成一家之言，或對傳播的學術和專業有

過顯著影響的著作，都予列入。我們認為，現階段呈現傳播學的諸般「可能」，遠比為它劃定界線重要得多。

譯者都是這一行學有專長之士，自選他們心目中的傳播學經典之作。有的選書，是因為那本書是他的「聖經」；有的選書，是因為那本書是他的「最愛」。編輯委員會都予尊重，因為這樣可以避免編輯委員會先入為主劃地自限；其次，無論是個人的聖經或最愛，多年廝磨，翻譯起來當更得心應手。謝謝他們為描繪傳播學面目所盡的力。

《傳播學名著譯叢》編輯委員會 謹識

民國八十年十月

目 錄

《傳播學名著譯叢》譯著前言

作者序言

譯者導言

譯例說明

第一章 科技與社會	21
一、關於科技與社會之因果關係的各種看法	22
二、電視這種科技所由產生的社會歷史	27
三、使用電視科技的社會歷史	32
第二章 科技制度	47
一、早期發展的類型	47
二、當前發展的類型	56
第三章 電視所表現的文化形式	61
一、早期各種形式的綜合與發展	61
二、混合形式與新形式	92
第四章 節目編排：分佈與流程	101
一、五個電視頻道的分佈比較	101
二、以順序或流程的眼光，來探討節目的編排	109
三、流程的分析	121

第五章 科技效果與科技使用	149
一、傳播系統的因果效應	149
二、效果研究舉隅	153
三、科技是造成效果的原因	158
四、科技是特定社會下的效果	161
第六章 替換性科技, 替換性使用?	169
一、發展中的科技	170
二、新科技的制度	175
三、替代性使用	183
原著參考書目	191
中英對照索引	
英中對照索引	

作者序言

電視既是一種科技產物，也是一種文化形式的表現，二者有什麼關係，是本書所要探討的主題。科技、社會制度與文化，三者之間的關係，在當前已引起廣泛辯論，其中，電視毫無疑問是個很突出的例子。電視是科技的一環，有賴於社會制度的配合，更是文化生活的寄託；也就是說，科技、社會制度與文化三者等於是在電視身上找到了聚合的焦點。就此而言，電視的特殊性與重要程度，舉世難有匹配，它實在是佔有無與倫比的地位。

先前，我出版了《革命之道長且遠》（*The Long Revolution*）與《傳播》（*Communication*）二本書，從那時候開始，我心中就一直在思索這類問題。當時，這二本書的論述重點，放在印刷與不同文化制度的關係。本書延續了筆者寫作前述書籍的精神，在著手進行社會史的研究與社會分析之時，不徒託空言，而是對於直接與此相關的特定傳播過程與物質關係，展開批判性的分析與檢視。從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二年的四年之間，我按月撰寫電視評論，發表於BBC的《閱聽大眾》（*The Listener*）週刊。那個時候，我可以自由決定想要寫什麼題目，經常也就嘗試以綜合論述的筆法，記錄我對於特定的電視節目或形式的觀感與印象；體育活動、旅行、警探連續劇、廣告片、政治報導、評論等等，皆入筆中。在這段時間寫就的文章，自然提供了本書若干的背景素材，從中我也吸取了若干經驗；不過，本書主要完成於加州，一個電視環境

與英國非常不同的地方。藉此機會，我比較了英美電視的運作。同時，我也藉此機會與史丹佛大學的傳播系同仁，多方討論；他們對於新而漸次問世的電視科技，素有研究，其中若干成果對我助益尤大。以下人士，我尤其要深表謝忱：Edwin B. Parker、撥冗與我討論的舊金山KQED商業電視台的Rice先生、英國的Nicholas Garnham先生、以及幼子Ederyn Williams博士。第三、四與六章的完成，內人的研究成果貢獻良多，不可或缺。對於Jonathan Benthall先生，我也深表感謝，在本書寫作過程，自始至終，他都提供了助力。

雷蒙·威廉士

加州史丹佛、英格蘭劍橋

一九七三年一至六月

譯者導言^①

本書作者雷蒙·威廉士，在英國知識社羣中，占有獨特地位，被舉為該國最為秀異的政治思考者。以英國人的立場論事，不免要說法國的沙特可以相當於英國的威廉士。雷蒙出身文學批評，但著述廣泛，而且成績斐然，劍橋大學的同事總愛說他是社會學家或史學家。譯者寫的這篇導言，分為四個段落，從威廉士的生平開始介紹，然後進入他的政治與社會活動，再次則引述他主要的著述與論點，歸結於本書重點的評估，並兼及威廉士與英國傳播媒介研究的關係。

一、生平概要

微有起伏的山巒腳下，是班弟(Pandy)，一個界於英格蘭與威爾斯的邊城。一九二一年雷蒙·威廉士誕生於此。十八歲那年，青年威廉士來到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延伸中學時期的興趣，主修文學。原本已經略有文字習作經驗的他，至此更是熱中於小說詩文的創作。另一方面，威廉士早熟的政治細胞也在劍橋繼續發酵：出任學生會主席，發表論政文字，參加政黨發起的讀書會討論活動，這些，都可以看成是日後威廉士對於政治社會事件保持高度關心，並且介入的早期徵象。

①本文資料，大多取材於《自立早報》副刊，民國78年4月2日至3日；以及民國80年1月25日至26日。

一九四一年七月，威廉士被徵召入伍，戰爭結束之後返回劍橋大學，補修完成正式的學院教育。此時，校方提供每年二百英鎊，讓他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然而，威廉士無意於此，除了當時他已經有了二個小孩，以及另一份年薪三百的工作比較具有吸引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他本人的個性不願意再接受學院的規範。因此，威氏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到了牛津，開始從事勞工成人推廣教育，其間並夥同友人興辦雜誌。除了藝文創作與理論著述之外，對於時事與現實政治的興革也投注心力。一九六一年，劍橋大學的基督學院延請他前往任職，被舉為院士，並在一九七四年出任教授，一九八三年退休，一九八八年元月二十六日猝然辭世。

二、政治社會活動

威廉士是威爾斯人，在歷史上屬於被英格蘭人征服的少數民族，因此，他雖然已經不能使用威爾斯語（類似台灣的平埔族），但骨子裏似乎已然根植反抗外力強權的因子，終其一生。也許因為這個緣故，當全球經濟轉惡，普遍失業從徵象轉為事實，進而刺激了英國「左派書社」（Left Book Club）在一九三五年出現並且成功營運的時候，威廉士首先就從該書社出版的圖書，接觸了殖民與帝國主義等問題的討論。在另一方面，或許是由於父親出身鐵路信號工，而且涉入工黨（Labour Party）甚深，他在十四歲時，就第一次充任義工，替工黨助選。自幼基本政治立場已然劃定，也許並不特殊，但威氏比較不同的地方或許是「老而彌堅」。很多人年過四十而趨向守成，但他在那個歲數進入劍橋大學工作，批判現世的精神與行動，較諸中年以前，如果不能算是更

爲激越與基進 (radical, 譯者注: radical一字有基本的、激進的雙重意義, 我一般譯成基本而激進的, 本書中則沿用部份學者所通用的「基進」解釋), 至少是毫不遜色於後生。當然, 他對於政黨並沒有幻想, 他經常表示不能認同工黨的黨綱或政策 (甚至應該說是反對); 事實上, 一如他早年加入英共而早於同儕退出, 威廉士對於工黨也深表不滿。

一九六六年, 爲了工黨政府支持美國介入越戰 (Vietnam War), 他正式退出該黨; 只是現實政治往往容不得人們率意行事, 在堅持有所不爲之外, 仍然必須有所作爲。威廉士對於工黨的很多事務, 都不以爲然, 但這並沒有讓他從社會活動中退縮而只求自保, 他也沒有變成犬儒而只憤世嫉俗。真實的情況是, 政黨之不足恃, 促使他更加執著於草根意識與國際胸襟的養成運動, 繼續透過文字與社羣活動, 不斷參與社會事務。此外, 在選舉來到的時候, 或許是基於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心理, 威廉士依舊挺身正式替工黨助選。但他總愛說「週四投工黨, 週五反工黨」。理解現實但不默然接受, 堅持當權者永遠必須被人民批判與督促, 這樣的見識與行動, 事實上並不單見於威廉士, 與他大約同期間學於劍橋大學的著名史學家湯普森 (E. P. Thompson) 與霍布斯班 (E. J. Hobsbawm) 莫不如此。或許這是英國智識份子的一種典型。一九七九年, 柴契爾 (M. Thatcher) 領軍保守黨, 取得政權, 以未及半數選票, 而却能夠得到絕大多數國會議員席次, 原因之一, 就在英國選舉制度的不合理。工黨執政期間, 他就已經指陳這種制度的不民主。一九八八年末, 英國知識界發起憲章運動, 他們主張將這種制度修改爲比例代表選舉制, 如果不是早逝, 威廉士必然是發起人之一罷!?

綜括威廉士對於社會行動的期許與看法, 或許以他自問自答的一段文字, 最爲傳神!

如果有人要我將自己的立場，做個最後陳述，我會這麼說：
把勞動階級組織起來，進行經濟上的抗爭，是最能夠更新社會體質的活動；……(但是)代議民主作為一種原則，並沒有割捨的必要，雖然我認為我們的視野要超出其限制……我們應該以全然不同的政治行動來支持社會主義的出現；……從資本主義社會之內產生的各種意義與價值體系，我們必須憑藉智識與教育工作，以最具有持續力的方式，經由長期抗爭，將它們整片拔起，從根鏟除。這就是我所說的「革命之道長且遠」(the long revolution)……。

三、著述與觀點

威廉士在理想社會與現實政治之間抗爭；在學術研究當中，他則來回於抽象的形而上思維與具體的分析之間。一般說來，他的早期著作(不是全部如此)存在有濃厚的文化情結(culturalism)，有人甚至指責他不願意或是沒有充分地分析物質運動的過程。因此，他的學生伊戈頓(Terry Eagleton)，在一篇著名的論文裏，先禮後兵，以愛師但更愛真理的態度，毫不留情的說他是膨脹了主體的力量而竟至於像是全然不顧結構的限制；太過於強調共同的文化，而流於從空洞的人類學角度論事，不能合理的剖析文化本身乃是意識形態的產物，往往有其強不同以為同的霸權壓迫作用；歌詠人性的本質而至把政治現象一併比同。這些，伊戈頓說，都是威廉士「浪漫民粹主義」(romantic populism)的表現。威廉士之所以如此，則是因為他本人出身低層，奮鬥以後晉身社會中流，太過於推己身之經驗為公眾之歷史的緣故。伊氏所指陳，

雖有部份道理，但不免以偏概全，誠如他自己日後所說，當年的孟浪放言，盛氣凌人，苛責師長之處實在有失公道。如果平心的論斷，應該是說，威廉士一直是在兩極之間徘徊。一方面，他的確是以觀念理想論者 (idealist) 的立場，評述文化在社會形構之內的角色；但他也同時以物質論者 (materialist) 的身份，看待文化之內的各種活動與行事。並且，就如巴內特 (A. Barnett) 所觀察到的，威廉士「愈來愈強調物質的作用了」，一九六八年以後的著作，尤其如此，這就是他謝世前十多年反覆致意文化物質論 (cultural materialism) 的原因。比如，在《邁向公元二千年》(1983)這本書中，威廉士不只一次的分析，在跨國公司與精英都會智識份子合力運作下，文化與政經社會生活所面臨的困境：前者挾其經濟實力真槍實彈地將文化推向同質的路徑演進，後者則在理論層次上進行攻防的工作。

當然，上下層之間的決定論問題，從來就不容易解決。十多年前，哥丁 (P. Golding) 與梅鐸 (G. Murdock) 曾以討教的口吻質問到「真是詭異啊！他一方面強有力的指出，密切處理經濟決定論的問題，是文化社會學不可或缺的一環；他同時却又堅持，在文化生產過程與經濟運轉的動態之間，絕無可能找到從屬的關係。」誰又真的能夠提出讓人滿意的答案呢？梅鐸現今的論文，不是回過頭來引用威廉士的著作，指出決定論「宜取其所設定的層層限制與無時不在的壓力，而不好說是傳播內涵可以預測而歷歷不爽，或是傳播內涵已被(政治經濟力量)完全控制」。從政治與經濟的分析入手，然後出乎文化的關懷與興革，確實是研究社會現象所必須努力的方向。但不要忘了，在缺乏有用之論述可供參考的情況下，威廉士幾乎孤力取得的成就，已經非常可觀；畢竟，今日的文化研究或政經探討，仍然在走向匯通之路上猶豫，威

廉士至少是跨出了勇邁而結實的一步。

晚近十多年來，由美國傳至歐洲，西方世界(近幾年的台灣也是如此)談論「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的熱情有增無已，威廉士曾在《邁向公元二千年》裏，這麼寫著：

「現代主義」有兩個面目。就其創新的一面來說，它們確實摧毀了早先資產階級社會的固定的表現形式；不幸的是，在漸次沉澱之後，它們竟又變成人類文化史中，表現存在事物之最為粗簡的形式。那些飄渺無定而經常顯露絕望的影像，從何而來呢？就從那些鮮少，或者甚至是無法與他們所賴以存活的社會發生連屬的文人身上，生發蔓延；這些飄如陌上塵的文人，多的是片斷與無根的感覺，多的是淪喪與人溝通之能力的喟嘆，在他們把這些愁緒傳播開來的過程，「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建制(establishment)也就構築了起來。

以後人文思潮的發展，是不是也會朝著這個方向演進，否定了後現代主義之中虛無的成份呢？這也許是日後我們可以觀察的一個現象。

生前，威廉士的論述以書籍形式出版的共達二十八本。去逝的幾週之內，學術期刊的追念，披露於報端的文章已有十數篇。英國四個電視廣播網之一也為他舉行了一次討論會。對於生前主張傳播資源要由公眾所有(public)，反對商營的威廉士來說，這些飽受他訾議的私人產業仍然對他如此禮遇，反映出他畢竟是跨越黨派，超出意識形態的界線，是人心所共的資產。威廉士離開人間未及二年，又另有四本後人與門生將他生前仍在寫作的文字，以及學者論述威廉士的文字，編成文集行世。他的論述被收入別人編纂的專書，數目高達九十篇。發

表在日報、週刊、月刊以及學術期刊的論文、時事雜文、書評以及電視評論，更是讓人咋舌，達五百六十七篇。在英語世界中，以類如威廉士那般嚴謹的態度，論述文化、社會與文學而有如此成績，並且擁有廣大讀者羣的人（截至1977年，單在英國本地，他的著作已賣出七十五萬冊），可能再難找到。

除了這些直來直往的議論，威廉士也通過文藝創作來表達他對社會人羣的看法與期望，其中，小說是他最常使用的形式，數量與品質俱佳。然而，威氏並不是赤裸裸地想要文以載道，事實上，從讀劍橋大學的時代，威廉士就對他一度加入的共產黨的文藝路線甚表不滿。他認為過份地把藝文當成工具，只能使文藝變成教條，這樣的文學觀，貫穿了他的一生。相比於耗費在硬性論文的時間，威廉士盡力在抒情言志的小說，其實更是嘔注心血，不斷地往返增刪與校閱。比如，他在生前出版的五本小說，寫作綿延的時間，短則六年，長者竟達二十載，修訂的次數也在五到七次之間。畢竟，天才從來不可依恃，唯有苦功能夠成就人事。

然而，著作等身並不能立刻等同於成績或影響力。就文字工作而言，數量眾多不是品質的代表。相反地，如果筆墨多屬應酬與時論，難免會以量害質，損害了創意。以威廉士的情形來說，質與量却是難得的相符，兩相共生共長，提攜彼此；因為這個原因，威廉士乃得到士林的敬重，彌足讓人景仰。亡故以後數量繁多的悼念文字、活動與論文集不列入計算，有關威廉士之資料編錄成重要學術參考書的，至少有六種：專門以他為對象進行訪談而發表的文章，至少在十回；評論他的著作，細論或總論他的政治社會文學觀的期刊文字，應當不少於一百四十篇（國內亦有專以威廉士為對象的碩士論文^②與介紹文字）。他的部

份專書，至少已經翻譯成七種外國語文。（中譯方面，散篇論文不計，《文化與社會》已由聯經出版社發行。）

另外，除了因為反對越戰，憤而拒絕接受美國學府的邀約將近十年（1965—1972）以外，威廉士的足跡多次越過英吉利海峽，親履法國、德國、義大利與南斯拉夫，講學並結交學術或政治上的友人。威氏的影響力，不單是要從其著作的銷售狀況窺知，最能直接表現出他過人之處的，或許還在於他所融鑄的觀念與語彙，已經成為人們討論相關問題或現象之時，所經常援用引伸。以本書為例，有二個概念，迄今仍然得到學者反覆的引證，其中電視的「流程」（flow）在本書第四章有比較集中的介紹，譯者也曾就此為文討論^①，在此不再複述。第二個概念則是「流動的藏私」（mobile privatisation），現在進一步解說於後。

威廉士在一九六四年的小說《第二代》裏，首先醞釀了這個觀念，十年後在《電視》這本書正式加以命名。之後，不但引用的人不僅限於文化與大眾傳播研究學界，到了一九八〇年代時候，社會與政治經濟學界為了解釋柴契爾主義，也將「流動的藏私」引為主要的依據之一。

將近三十年前，威廉士試著以駕駛汽車的經驗，比喻工業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他說，人在車中，手握轉盤，無論是東奔或西馳，心中感受到的是隨心所欲，耳際環繞的是可輕可快的音樂；在這流動的車殼裏面，隱藏著暫時脫離外界的個體。可是，只要稍作思索，開車的人不難發現，如果沒有公共道路，哪裏也去不了；如果其他開車的

①謝國雄，1984，〈文化取向的傳播研究——雷蒙·威廉士〉，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②〈電視節目的流程分析〉，《當代月刊》，民國79年，8月號，p.138-142。